

海外和港台中国人研究书系

从传统

金耀基 著

到

现代

海外和港台中国人研究书系

第一篇 中国的传统社会

引言 传统性社会的定义与界定

经济制度

价值系统

政治体系

社会结构

人格构造

结语

第二篇 巨变中的中国

引言

中国的巨变

转型期社会的素描

中国过渡人的画像

结语

第三篇 现代与现代化

引言

现代一词之意义及其问题

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的本质与过程

现代化的困境

现代化的选择与出路

第四篇 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中国现代化与本土运动

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层次

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方向与步骤

中国现代化之前瞻

从传统



现代

海外和港台中国人研究书系

金耀基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传统到现代/金耀基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海外和港台中国人研究书系)

ISBN 7-300-03208-7/C·178

I. 从…

II. 金…

III. 传统文化-关系-现代文化-中国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216 号

海外和港台中国人研究书系

从传统到现代

金耀基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5 000 印数: 1 5 000

定价: 16.00 元 (平装)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

献 给
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人

——他们忠于中国的过去，
更忠于中国的将来。

F581/17

出版说明

熟悉中国现代化史的人都知道，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性格特征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面对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而产生的自尊和自卑交织的复杂情感。由于摹仿西方文明（包括器物 and 制度、文化）而产生的对于自身固有文明的理智和情感的冲突，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观念世界发展的主旋律。

1978年之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我们再度直接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将中国人的观念冲突外化为文化虚无主义、复古式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并在不同的阶段各领风骚。而这些思潮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

然而，在种种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议论中，有一种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即海外和港台地区的华裔或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看法。

这种视角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原因和教育背景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分析中国人

I

出版说明

和中国问题的独特切入点，与纯粹的西方学者相比，他们与中国存在着不可割裂的情感纽带，因此他们既置身事外又身在其中，别有深意。其二是台湾和香港地区又是东亚现代化奇迹的创造者，它们的成功丰富着现代化的模式，在文化上和民族心理上更具意义。

因此，我们推出的“海外和港台中国人研究书系”旨在介绍海内外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反思的代表性著作，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注意学术品位和现实意义的结合，这次编辑出版“海外和港台中国人研究书系”正是这种风格的延伸。由于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所以我们衷心希望获得海内外学人的支持，也渴望读者的建设性意见，使我们能为读者奉献更好的作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

简体字版自序

书的际遇与命运往往是独立于作者的。《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的际遇与命运就不是我撰写时所能见到的。至少，在 33 年前此书付梓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在大陆问世，说实在，过去三分之一世纪中国的变化是太大了。

1966 年我在台湾出版《从传统到现代》，而就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很容易看到我出此书的用心所在与心中愿景，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个反现代化运动。诚然，当时，台湾与大陆完全处于隔绝的状况，我写书时对正在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了无所知，不过，读者可以发现，我心中的中国是文化的中国，民族的中国，以此，台湾与大陆在我的书中是不分的，当我讨论到“巨变中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时，我的论述的对象实际上是台湾，我想象中的读者

主要地也是在台湾的中国人。

在过去 33 年中，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已相当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跃进为一新兴的工业体系，并已初步地踏进现代社会之林了，而大陆于 1978 年之后，亦积极推动现代化，并取得了骄人成绩，至于香港在过去 30 年中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现代化中。我几乎亲眼目睹香港由一个殖民统治下的城市转化为一现代化的国际都会，简言之，中国的三个社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落在现代化的坐标上，只是有者走得早，有者走得迟，这对于一个以中国现代化为“理性宗教”的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鼓舞。这三十多年来，《从传统到现代》使我得到无数知音，但也遭到许多善意与不善意的批评，甚至不少恶毒的咒骂。

现在，《从传统到现代》正式要在大陆以简体字版与读者见面了。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向我提出这个出版构思时，我确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本可算是我的“少作”的书在 21 世纪的前夕再在大陆出版有无意义与价值？我思量的结果是，还是让它与大陆的读者见面吧！这是它的命运。虽然此书出版已久，里面有许多地方，不但写得粗糙，而且颇有滋疑，但是它毕竟是第一本有系统地用社会科学知识论述中国现代化的中文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鼓吹”中国现代化的书，到此刻为止，

我仍然相信我在原版自序上的话：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我应该指出，在台湾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更应承认，我当年“鼓吹”现代化时，的确是过于乐观的，并且对现代化理论是缺少应有的“批判性的反省”的。70年代以还，西方自法兰克福学派导引而起的“现代批判”（critique of modernity）也移植到台湾，因而对台湾的现代化和对我的现代化论产生严厉的抨击，不可否认，其间不少是具有严肃反思智慧的（杭之1987年的《一苇集：现代发展的反省断片》是一例），但有许多反现代化论调则多是无根的游谈，对台湾现代化的发展了无裨益。在西方，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讨论在80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出现了所谓“现代性论辩”。这是较复杂的课题，我在他处已有所论述。简言之，80年代以还西方有“现代终结”的口号出现。有各色各样批判“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调，但是，在我看来“现代”是否“终结”的辩论，在西方或有一些经验的意义，而就全球而言，更有意义的显然是“全球的多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的论题，至于对中国来说，中国在21世纪

最大的事业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某些批判，或正可以使中国的现代化得以避免一些“现代性”建构中的陷阱或减轻现代化过程中的错失与伤痛。严格地说，中国只有经过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后现代问题”。墨西哥 197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斯（Octavio Paz）说，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的。他充分了解现代化对墨西哥古老文明可能造成的伤害，但他说：“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惟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我要说，中国一样是“命定地现代化”的。凡是古老的文明如中国、墨西哥要在世界上立足，要在全球化的社会有新的生命，新的贡献，是不能不自觉地有一个“现代转向”的。

中国需要现代化，在今日看来，几乎是“自明之理”，但在 33 年前，当时台湾的知识气候（或者说官方的知识气候），讲现代化虽非禁忌，却是不合时宜的，现在回头看，同时大陆正爆发“文化大革命”，自然不可能有讲现代化的声音了。对我最大的欣慰是，《从传统到现代》甫问世，台湾的知识界就给了它很热切的欢迎与回响，之后一印再印，如果销量是一个指标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它确是台湾知识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一本思想性读物。关于此书在台湾思想史的定位问题，傅大为先生 1990 年写《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过渡到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一文作了一些分析。说实在的，对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评论虽然不少，但真正有力地触及到此书根本性的意义与问题的则是刘小枫先生 1994 年 2 月所发表的《金耀基的“现代化”论及其问题意识》一篇严肃的评论文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刘小枫对此书（及其他我的相关文字）的批评很深刻，如他指出我所建构的重点不是“现代性”而是“现代化”，又如他指出：我“给‘现代化’注入价值论的判断和个体旨意，从而出现了现代化论中内在的‘实然’与‘应然’，价值中立与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与紧张”，他也委婉地指出我的论述并没有能恪守我自己提出的知识学原则。他更锐敏地看到我的问题“主要从文化论争中来的”，从而“出现了知识学类型从社会学向文化学的重点转移”而导致我的“‘现代化’论的问题意识的单向性”。刘小枫对《从传统到现代》的意义则亦有深获我心的论断。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心志趣向，他说：

从汉语思想学术百年经历来看，现代化论的学术效力是，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人文学的论域（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对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会问题言述有至今难估量的学术意义，金先生致力于社会科学在汉语知识界的确立和扩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论，实际促成了汉语思想学术言路的转向。

刘小枫又说：

我以为，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的学术言述是汉语现代学的先驱性理论建构。在金先生之前，涉及现代现象的汉语学家和文人的话语不胜枚举，但金先生的学术言述自觉地致力以社会科学之实证知识为工具来建构关于现代现象的理论，即现代化理论，虽逾二十余年，至今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在现代汉语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

我引了刘小枫先生这两段话，恐不免有“戏台里喝彩”的意味，但坦白地说，《从传统到现代》出版 33 年，真正使我有瞿然以惊的评论就是刘小枫的这篇评论。读了他的评论，我确有“知我、罪我，其惟小枫”之感。

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 20 世纪未竟之事，也是中国人 21 世纪最根本的大业。我诚恳地希望简体字版《从传统到现代》的新读者能够了解我写此书的心志，并以批判的眼光与此书对话。

金耀基

1999 年 10 于香港

自序

—

19世纪末叶，中华帝国的大门为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猛然撞开，从此，西方势力，如狂飙暴雨，一侵而入，整个中国赤裸地、无力地呈露在帝国主义的利爪之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旋踵之间，神州大陆沦为了“半殖民地”的悲境，这竟不是一场恶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生长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极端的严重之秋，除非感情已麻痹，大脑已冰冻，焉能无动于衷？

百年来，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如巨浸稽天，逆泳无力，整个社会的结构面对了全面的解组，整个文化的价值面对了彻底消失的威胁。华夏文明，上国衣冠，竟沦到若有若无的凄局，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临这样一个文化绝续三千年未有的变局，除非血已凉、心已死，又焉能作太上之忘情！

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中，我们可以了解，

何以自清末以还，站在第一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郭嵩焘、严几道、梁启超、胡适之、梁漱溟诸先生以降，无不把精力心血投注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及是自救发展之道上。而作为一自觉的中国人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我，自做一个少年的学生起，就为讨论这方面的文字所吸引住了，半个年代以来，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不是日减，而是日增，甚至逐渐形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不论在求学或讲课阶段，也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时期，我总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热忱，有人问我，何以对这个问题孜孜不倦，以至于此，我的答复很简单：因为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最根本的问题。

二

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关切是一致的，但各人所持的观点则有极大幅度的差异，因此，乃逻辑地引起了全面的文化论争。

中国文化的论争从大学士倭仁在 1867 年给同治皇帝的奏折算起，到现在已经有 89 年的历史了。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论争，从用文言到用白话文，年复一年，不知白了多少人的头发，也不知耗了多少人的心血。但我们仔细检视这方面的议论，除了极少数的文字系以理智为导引，而表现出健康可敬的见解外，绝大多数则不脱情绪的牢范，尽管从清末到五四，从五四

到今日，中西文化的论争表面上显得非常热闹，但粗率地从骨子里分析，则皆不能跳出国粹主义派、“全盘西化”派及折衷主义派三派的范畴。许多皇皇大论或辛辣刺激、或文采风流，固然一时颇能掀动人心，赢得许多喝彩之声，但如把他们的言论予以煮干，则可发现只是一些文艺性、策论性的清说与玄谈。清说与玄谈本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有力的传统，所以文化问题一到了他们手中，便是做文章的大好题材，尽管没有丝毫文化学方面的知识的训练作基底，却仍可神驰心游，下笔千言，他们把文化看做了一团面粉，可以使之圆，也可以使之方；可以使之短，也可以使之长，只许让文化来贴就自己的意见，而不去理解什么是文化，于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文化问题乃变成了最廉价的问题，此所以中西文化的论争始终在层层迷雾中打滚，看不到一清澈的方向。五四以来，中西文化的论战，变成了个人追逐虚声的最佳也最便捷的道路，但所提出来的见解，除极少数外，上焉者只能算是个人的“意见”，下焉者则只是“意气”而已，但都逃不出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格局，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理想化”为一不待外求的“自足体系”；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丑化”为一无所是的“断烂朝报”。其实，文化问题是极不好谈的，它是一个大得复杂得足以令人却步的题目，而像中西文化这样的大题目更是棘手。人类学者赖德菲尔特（R. Redfield）与辛格（M. Singer）就曾指出，即使像汤因比（T. Toynbee）、诺索普（F. S. C. Northrop）二人所陈

示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满意或接受的。诚然，社会文化是一“全体系”，它的复杂的性格有一“多变项的因果关系”（multi-variate causation and consequences），因此决不能执一以概全，许多人随便捡拾古人的一个思想或现实社会的一个事实，就拿来支持他预定的假设或判断，殊不知该同一思想或事实，常常也可被用来推翻他的假设与判断，除非我们了解，社会各个结构间的功能关系，我们实无法作一客观的判断。再则我们讨论中国的社会文化，必须把它的“理论层”与“行为层”合起来看。从理论层说，中国文化是有一“理想形象”（ideal image）的。但从行为层说，则中国社会实与中国文化的“理想形象”迥不相侔，从而，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必须并二者而合谈，否则不是涉于主观，便易流于意气。

我们以为当我们在谈论一般性问题时，普通常识与灵感是还可以勉强充场面的。但一涉及专门问题，特别是文化问题时，就不免显得浮浅了。要谈文化问题起码需要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特别是行为科学的知识，亦即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到现在为止，人类的智慧还没有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文化科学”（a unified science of culture），所以我们不能不努力地从这三门科学中去发掘必要的知识以为讨论的基底。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冲突，或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在根本上说，实是一“社会变迁”的问题。要了解社会变迁的原理，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人类学者所研究的文化与原初社会，社会学者所研究的社

会结构以及心理学者所研究的人格形成，基此，海根博士（E. E. Hagen）在其大著《社会变迁的原理》（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中就强调了科际整合方法的必要性。有的学者如雷格斯（F. W. Riggs）者更认为我们要对变迁中的社会文化有一全面的理解，除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之外，还应求助于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科学，亦即运用一综合性的研究，故而不只应该用科际整合方法，还应用“泛科际整合方法”（pan-disciplinary approach），而我们运用这种方法，要在研索探求社会现象间的“功能关系”，以建立一“系统分析”或“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在数学与物理学中早已普遍使用，经济学近年来亦已日趋接近，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应致力于此。在分析模型中，一切陈述都只是分析的，记述的，而不作任何规约的、价值主观的评断，也就是只讲“实然”，而不讲“应然”，因为必如此，我们才能就事论事，做到“是山还他一山，是水还他一水”的田地；才能摆脱情绪的鼓动，进乎斯宾诺莎所说“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的境界。在本书里，我的讨论就是尽可能以上述之方法为导引的。因此，在我这本书中，读者将不易找到形而上学的冥思，更不易找到独断的刺激。当然，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我在作分析的时候，是不能完全免去主观的推断、臆测的成分的。